第五个女人

引子

信是 1993 年 8 月 19 日到达于斯塔德的。

上面盖的是非洲邮戳，她断定是母亲写来的 ， 便没有马上拆开 。

她希望在平和而安静的时候读信 。 从信封的厚度看，里面肯定有很多页。她已经三个多月没有收到母亲的信了，这封信里一定有不少消息。她把信放在咖啡桌上 ， 想等晚上再读，可又隐隐感到不安。这次母亲为什么是打印了她的名字地址呢？毫无疑问 ， 答案就在信里。

深夜时分，她打开通向阳台的门 ， 在花盆旁坐下。这是个美好、温暖的仲秋之夜。或许今年很难再有这样的夜晚了，秋天已经悄然而至 。 她打开信 ， 读了起来。

读完信 ， 她不禁痛哭失声 。 信是一个女人写来的。 笔迹甚至措辞都很讲究，写信的女人尽可能仁慈地讲述了所发生的可怕实情。

信上署名是弗朗索瓦丝 •贝特朗，一个警官 。 她的

官衔不十分明确 ， 但她负责那个国家重大杀人案件的刑事调查工作，所以她了解到了 5 月份发生在非洲北部一个偏远荒漠城镇里的这些事件。

案件事实清楚 ， 但特别可怕。四位修女 ， 都是法国公民，被不明身份的袭击者割伤颈部惨遭杀害。杀人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只有遍地凝结的厚厚的血迹 。

可是，还应该有第五个女人，一个瑞典旅行者。在杀人者持刀出现的那个夜里，她恰巧来拜访这些修女。她护照上的名字叫安娜·安德，六十六岁，持旅游签证来到这个国家。护照里夹着一张未注明日期的往返机票。由于四位修女同时遇害已经够耸人听闻的了，而安娜·安德好像又是独身旅游，迫于政治压力，警方决定不提及这第五个女人。他们只说那个致命的夜晚她并不在那里 ， 同时报道说她因车祸而丧生 ， 然后就把她埋葬在无名荒冢。就在此时，弗朗索瓦丝·贝特朗参与到了此案中。她在长信中写道：一天早上，上司打电话给我，叫我开车去修道院，任务就是销毁这个瑞典女人的护照和随身物品。

好像安娜·安德从来没有到过或在这个国家停留过一样 。 她已经不存在了，从所有官方记载中消失了。弗朗索瓦丝·贝特朗从衣柜后面找到了被调查人员忽略的一只旅行袋。里面有安娜·安德写的信， 信是写给居住在遥远的瑞典叫于斯塔德镇的女儿的。弗朗索瓦丝·贝特朗说很抱歉她读了这些私人信件，并请求一位嗜酒成性的瑞典艺术家帮忙翻译给她。他读信时，她就把信的内容记了下来 。

那时 ， 弗朗索瓦丝就已经对第五个女人的遭遇感到痛心。不仅仅是因为她在这个国家惨遭杀害 ， 而且因为她自己深爱自己的国家。尽管父亲出生在法国 ，但她心在非洲 ， 并为分裂祖国的内乱而感到十分痛心。她不愿意违背自己以及国家的良知 ， 错上加错地把这个女人消除掉，甚至拒绝为安娜·安德的存在负责。弗朗索瓦丝为此开始失眠。最后，她决定给已故女人的女儿写信，告诉她真相。尽管要忠诚于警察职业，她还是强迫自己采取了行动，只是请求为她的名字保密 。我在告诉你真相，她在长信的最后说，也许我把发生的

一切告诉你是个错误，可是我又该怎么办呢？

弗朗索瓦丝·贝特朗把第五个女人没写完的信和护照装进了信封。

她的女儿没有读这些信。她把信放在阳台的地上，哭泣了很久。直到凌晨，她才站起身来。走进房间，她木然地坐在餐桌旁，头脑一片空白。可是突然，事情好像变得简单了。她意识到，自己这些年来什么都没做，原来一直都在等待。她一直在等待这个事实。为什么等待？现在她明白了。她有一个使命，她不需要再等待了。到时候了，母亲去世了，一扇大门豁然打开。

她站起身，取来放着自己裁好的纸条的盒子，还有她藏在床底下大抽屉里的一个大账本。她把叠起来的纸条摆在面前的桌子上，她知道，共有四十三个。她开始一张接一张地把它们展开。

带叉号的是第二十七张。她打开账本，用手指顺着向下查，查到了要找的那个目标。她注视着她记下的名字，慢慢地，一张面孔清晰起来。然后，她合上账本

，把纸条放回盒子。

母亲死了。她不再犹豫了。现在一切都无可挽回了。她要为在悲痛中工作一年做好充分准备。她重新来到阳台，点燃一支烟，注视着醒来的城市。一场暴风雨正从海面袭来。

7 点刚过，她上床睡觉。现在是 1993 年 8 月 20 日早晨。

第一章

晚上刚过 10 点，他终于写完了。

最后几节非常难写 ， 他花费了很多时间。他一直想用忧郁而又优美的词语，但几经修改 ， 结果都被扔进了废纸篓。

有几次他甚至决定放弃 。 可是现在，诗就摆在书桌上 。 那里充满着他对几乎从瑞典绝迹的啄木鸟的感伤情怀。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起，这里的人们就没有再看到过啄木鸟了 。 它们成了又一个即将被人类消灭的物种。

他站起身，伸展了几下双臂 。 随着年岁的增长，连续几个小时的伏案工作使他越来越感到吃不消。

老人就不该再写诗了，他想。七十八岁时，思维就不好用了。可他又认为这不对。只有在西方，老人才被娇纵，或者才被轻蔑地同情。在别的国家，老年被视为智慧的辉煌期。只要拿得动笔 ， 头脑清晰，他就可以继续写诗 。 他没有太多其他能力。很久以前，他曾做过汽车经销商 ， 而且是这个地区最成功的一个。他以

强硬的谈判而闻名。他的确卖出过很多汽车。在最辉煌的年代，他在图默梨拉和舍布都有分部。他挣了足够的财富来保证他优裕的生活 。 而诗歌是他最感兴趣的，桌上的诗句给了他难得的满足感。

拉开窗帘，窗外是一片延伸到大海边的田野 。 他走到书柜旁 。 他出版的九卷诗集，成排地摆放在书柜上 。 但每卷售量极少 ， 总共不超过三百本。没有售出的都在地下室的硬纸箱里。它们是他的骄傲和快乐，尽管他早已决定有一天要把它们烧掉 。 他要把硬纸箱搬到院子里，然后放一把火。等他得到无论是来自医生的，还是自己生命终结的征兆的死亡判决时，他就会毁掉这些没人买、甚至没人愿意麻烦把它们扔进垃圾堆的诗卷 。

他看看架子上的书。他一生都在读诗，也能背诵许多。他没有幻觉，他的诗不是最好的，但也不是最差的。40 年代末以来，大约每五年出版一本 ， 每一本中都有一些可以同最好的诗歌相提并论的诗句。可他的职业是汽车经销商，而不是诗人 。 他的诗歌也不被文化界

所接受，他没有得过任何文学奖励。他的书也是自己掏腰包出版的。

他曾把自己的第一本诗集送到斯德哥尔摩，他们给以简短的、事先打印好的回复 。 一个编辑还不怕麻烦做了个人评论。没有人愿意读仅仅关于鸟类的诗，白灶巢鸟的精神世界也没有意思， 编辑写道 。

从此以后，他不再在出版商那里花时间。他自己出版：简单的封面，不加任何修饰。里面的诗句才是最重要的。不管怎么说 ， 这些年来，很多人读过他的诗，很多人表达过对他的欣赏 。 现在，他又写了一首新诗，主题是身上中间带点的啄木鸟，一种在瑞典绝迹的美丽的鸟 。

要做歌颂鸟的诗人， 他想。我写的一切几乎都是关于鸟类的：鸟翼的颤动，黑夜中的疾驰，远方求爱者的呼唤。鸟的世界折射出生活最神秘的部分。

他拿起一张纸，最后的一节很好。他把纸放回桌子上。走过大房间时他感到背部一阵疼痛。病了吗？每天他都在注意着身体开始衰退的信号。他身体一直很好，

不抽烟，吃喝适度，这种生活方式保证了他的健康。可毕竟很快就八十岁了。他生命的终点就要来临 。 来到厨房 ， 他从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的咖啡机中倒出一杯咖啡。

刚刚完成的诗使他既难过又高兴。我的暮秋之年，他想。合适的名字。我写的任何东西都将是最后一个。9 月了，秋天了 。 无论是日历上，还是在我的生命中。

他端着咖啡回到客厅，小心地坐进陪伴了他四十年的棕色皮安乐椅里。这是当年为了庆祝自己在瑞典南部得到大众汽车特许经营权时买的。安乐椅旁边的桌子上，摆着一只阿尔萨斯狼狗沃纳的照片 。 在所有陪伴他一生的狗中，他最想念这一只 。 越老就越孤独 。 你生活中周围的人渐渐死去，甚至你的狗都随风而去 ， 很快你就会孤独一人。在生命的某个过程中，每个人都会这样。最近，他就试图去写这方面的诗，可是似乎总也写不完。也许他应该再努力。可是，他知道怎么写鸟，却不知道怎么写人 。 他理解鸟，人却深不可测 。 难道

他没有试图去了解自己吗？写他不了解的东西，简直就像非法入侵别人的领土。

他闭上眼睛，突然记起 50 年代末或 60 年代初的关于“10?000 克朗问题”的电视节目。那时还是黑白电视。一个斗鸡眼、头发溜光的年轻人选择了“鸟”这个话题。他回答了所有的问题，得到了一万克朗的支票，那时，这可是个天文数字。

他没有进过演播室，没有戴着耳机坐在那个小房间里。他就坐在这把安乐椅里。他也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，而且没有一次需要花时间去思考。可是他没有得到一万克朗，没有人知道他对鸟类渊博的知识。他只是继续写诗而已。

一种声音把他从白日梦中惊醒了。他在渐渐暗淡的房间里听着，院子里是不是有人？他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只是他的幻觉罢了，上了年纪就意味着得忍受焦虑。他把门锁得很牢。楼上的卧室里有一把短枪，厨房的抽屉里还有一把左轮手枪。如果有人贸然侵犯这个于斯塔德北部的偏僻农房，他能够自卫。他决不会犹豫

。

他从椅子里站起身，背部又是一阵剧痛。疼痛一阵阵袭来。他把咖啡杯放到厨房台子上，看了看表，快夜里 11 点了，该走了。他眯起眼看了看厨房窗户外的温度计，外面是七度。气压计在上升。西南风正轻轻吹过斯科讷 。 他想，今夜 ， 成千上万的候鸟，将展开翅膀从头顶飞过向南飞行。他看不见它们，可他在黑暗中能感觉到。五十多年来，他在田野上度过无数个秋夜 ，体验鸟飞过时的快乐。以至他时常感到整个天空都在移动 。

在冬季即将来临之前，鸟儿迁移的冲动是天生的，它们能数小时地在天空中飞行。整个黑暗的夜空随着鸟翼而震颤，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朝向圣地的迁徙。

与夜空飞行的鸟相比 ， 一个孤零零而又平凡的老人算什么呢？他视这种行为为神圣。站在黑暗中，他用年事已高的巨大身躯感受着候鸟的离去。春天到来，他又站在那里等候它们。它们的迁徙是他的信仰。

他走到大厅 ， 摸摸衣服挂钩。然后又回到客厅，

拿起桌子旁凳子上的短外衣穿上。上了年纪还意味着更容易着凉。

他再次看看书桌上完成的诗。或许他能够活到写完足够的诗来编辑成第十本，即最后一本诗集。他已经取好了名字：黑夜中的巨大身躯。

再回到大厅， 他穿上外套， 戴上帽子。他打开了门，外面，秋天的空气中弥漫着湿润泥土的馥郁气息 。他随手关上门，使自己的眼睛适应夜色 。 花园看起来很荒凉。远处，可以看到于斯塔德闪烁的灯光 。 他住的房子距离其他邻居太远 ， 这是能看到的惟一光亮。炜占负齷芮逦 悸 诵切恰L旒蚀Γ 钙 迫粱 粞帧＝褚梗 又愕哪袢嚎隙α峋 淖 啊?

他出发了 。 他的房子很旧， 只有三个厢房。尽管到现在还没有完工，可他已经花了很多钱来整修这座房子。他要把它全留给隆德的文化协会。他没结过婚，没有孩子。他卖汽车发了财， 有狗，还有鸟 。

没什么遗憾了 ， 沿着小路朝自己搭建的塔楼走的时候， 他这样想。

这是个美丽的 9 月的夜晚。可是，有种东西使他感到不安。他在路上停下来，听了听，可是只听到轻盈的风。他继续走。难道是疼痛，他背部突然的剧痛使他烦恼？这种烦恼好像是来自他内心的某种东西。

他再次停下，转过身来。什么也没有，就他一个人。 小路向下倾斜，又通向一块高地。就在高地前有一条宽宽的沟，他在上面铺架了小桥。他的塔楼就在高地上的最高点。他不知道自己多少次往返于这条路上。他熟悉每一处拐弯，每一道沟坎。可他还是很小心谨慎，他不想冒险摔伤了腿。老人的骨头很脆弱，他知道。

一只猫头鹰叫了起来 。 好像在很近的地方 。 树枝发出了声响，声音来自塔楼后面的树林 。 他站定住，每根神经都警觉起来。猫头鹰又叫了起来，接着是一片寂静。他低声咕哝了一句，继续朝前走 。

他低声说， 老了却害怕了，害怕鬼魂， 害怕黑暗。现在，他已经看见塔楼夜空中黑色的轮廓了。再走二十米，他就到了深沟的桥上。他继续走。猫头鹰不见了。一只黄褐色的猫头鹰，他想。毫无疑问，是黄褐色的

。

突然 ， 他停了下来。他已经来到了沟上的桥边。塔楼上有情况，他眯起眼 ， 竭力想在黑暗中看清楚，但辨认不出是什么。

我又是在幻想，他想，一切都照旧。我十年前建造的塔楼没什么变化 ， 是我的视力模糊了，仅此而已。他又向前走一步，跨上桥，感觉到了脚下的木板，眼睛继续盯着塔楼 。

真的出错了，他想，它比昨晚高了一米。或者说像梦境，我在看我自己站在塔楼上？

塔楼上有人 。 一个人的轮廓，一动不动。一阵惊悸，犹如一阵冷风传遍他全身。随后他很气愤，竟然有人非法侵入他的领地，未经他的容许贸然登上他的塔楼。很可能是个偷猎人 。

他对塔楼上的人喊了起来 。 没有回答，没有动静。他又不敢断定了：他的眼睛欺骗了他？眼睛太模糊了。

他又喊 ， 还是没有回答。他走上了桥。

桥板突然坍塌了，他头朝前直冲下去。沟有两米多深。

他感到难以名状的疼痛，不知来自何处，却像灼热的箭头刺穿身体。疼痛剧烈得使他连叫的力气也没有。咽气之前，他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到沟底 ， 他一直被悬挂着。

他最后的念头是候鸟，他上空的候鸟 ， 天空正朝南方移动。

最后一次，他试图把自己从疼痛中解脱出来 ， 然后一切都结束了 。

现在是 1994 年 9 月 21 日晚 11 点 20 分。那天夜里，成群结队的鸹鸟和红翅膀的乌鸹正飞往南方。

它们来自北方，穿过法尔斯特布高地，沿着西南航道，向着遥远的、等待着它们的温暖地方飞去。

当一切沉寂之后，她小心地从塔楼上下来 。 她用手电照照沟里：霍尔格·埃里克松已经死了。她关上手电，站在黑暗中。然后悄然离去。

第二章

9 月 26 日，星期一，5 点刚过，住在于斯塔德中部玛利亚加坦的库尔特·沃兰德就醒来了。

他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看自己的双手。它们被晒成了棕褐色。他靠在枕头上 ， 听着秋雨敲打在窗户上。想起两天前在哥本哈根的凯斯楚普机场结束的旅行，一种满足感油然而生。他同父亲一起在罗马度过了整整一周时间。那里很热。下午酷热难耐时，他们就在市民别墅花园里搬个长凳 ， 沃兰德让父亲坐在树阴下，自己却脱下衬衣，脸对着太阳。这是假期里他们惟一的冲突 ， 父亲不明白为什么他这样虚荣，非要把自己晒成棕褐色。

真是个愉快的假期，沃兰德躺在床上想，比我想像的还顺利 。

他看看表。今天得去上班了。可他并不着急，还可以在床上再躺一会儿 。 他伸手取来昨天夜里浏览过的报纸，看国会选举的结果。选举期间他在罗马 ， 所以他就投了缺席票。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是百分之四十五